

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满文《孝经》整理与研究

□ 陈虹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馆藏文献浩繁宏大，尤以善本特藏为其精华所在。其继承了南宋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明文渊阁、清内阁大库历代皇家珍藏，以及明清以来众多藏书家的毕生所聚。同时，又通过购求、捐赠等方式，丰富了馆藏书目。最终形成了包含善本、普通古籍、金石拓片、敦煌文献、舆图、地方文献、民语等种类众多、数量宏巨的洋洋大观。这些古老的典籍向后人讲述着厚重的民族奋斗史，展示着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

各少数民族文化亦是绚丽多姿的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国图老一辈学者黄润华先生曾言：“在发掘、整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宝库的工作中，除了汉文化外，对于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也必须给予极大的重视和关心，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完整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①。目前，国图藏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19个文种（佉卢字、焉耆一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察合台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八思巴字、彝文、满文、东巴文、哥巴文、傣文、水文等）35000余册（件），涉及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法律、军事、天文、地理等多个领域，可谓内容广泛、种类繁多。

在国图收藏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满文文献入藏最早，源于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在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时，由内阁大库拨交的40多箱满文图书，由此拉开了国图收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典籍的序幕。据《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提供的数据显示，国图收藏的满文图书约600余种，拓片约近700种，舆图约50余种，另有相当数量的档案^②。满文作为清朝的“国语”，在约300年的时间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形成了大量满文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文献对全面了解满族语言文字和清代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吴元丰、徐莉指出，现存的满文古籍，无论从内容来讲，还是从文种上看，都充分反映了清代多民族在文化上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③笔者曾撰《清代满文〈孝经〉研究》一文^④，对清代满译《孝经》情况予以介绍和探究，今仔细研读国图馆藏满文《孝经》后，认为其仍有挖掘空间，本文即以国图所藏清代满文《孝经》为例，系统介绍其版本情况，分析国图馆藏满文《孝经》的特点，结合其他版本，探究清代不同时期满文《孝经》的翻译特征。

^① 黄润华：《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管见》，《国家图书馆学刊》1983年第3期，第22—26页。

^② 黄润华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377页。

^③ 吴元丰、徐莉：《满文古籍印证清代多民族文化交融》，《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22日，第5版。

^④ 陈虹：《清代满文〈孝经〉研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五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第155—186页。

一、国图藏满文《孝经》版本介绍及馆藏特点

经笔者查阅，国家图书馆藏有满文《孝经》古籍共六种，其信息依次录入如下：

1.hiyoo ging bithe 《孝经》，和素校译，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一册，满汉合璧。线装，白口，开本 24.1×15.2cm，版框 18.9×14.2cm，四周双边，每半叶六行，版口自上而下依次为满文书名、满文篇章名、汉文叶次。卷前两枚朱印。书中满文行文有据雍正五年（1727）御制《孝经》校改痕迹，为墨笔。

此书卷末有满文记：

hiyooging be ubaliyambuhangge bihe. ulan ulan i sarkiyahai dašarabuhangge labdu ofi, gingguleme dasame acabume dasatafi nikan hergen kancime arafi folobuha.

elhe taifin i dehi nadaci aniya jorgon biya i sain inenggi.

译文：

翻译《孝经》，众人接替誊录，讹误众多，谨修兼以汉字刊印。

康熙四十七年腊月吉日

卷末并有“和素之印”“纯德”墨印两枚，均属和素。和素（1652—1718），姓完颜氏，字存斋，又字纯德，号静一主人。其以高超的满汉文翻译水平享誉于世，译有《黄石公素书》《资治通鉴纲目》《菜根谭》《七本头》等作品。和素以部院笔帖士入仕，累官内阁侍读学士，御试清文第一，赐巴克什号，充武英殿翻书房总管、皇子师。其祖先为金朝皇室，随着清太祖努尔哈齐在东北的崛起，完颜氏族人先后归附，后随顺治皇帝入关，迁居北京。其父为阿什坦，精通满汉文，尤晓儒学，是清代著名的翻译家，和素的翻译成就多受家学影响熏陶。

2.hiyoo ging bithe 《孝经》，和素校译，清抄本，一册，满汉合璧。线装，无格，每半叶六行，开本 21.8×18.5cm。书中满汉文行文均有零星朱笔校改痕迹。

3.hiyooging be acabufi suhe bithe 《孝经集注》，清世宗厘定，雍正五年（1727）满文刻本，嘉庆十七年（1812）译成蒙古文，并手书于满文旁，一册，满蒙合璧。线装，白口，开本 27.2×18.1cm，版框 21.1×16.1cm，四周双边，单鱼尾，每半叶七行，小字双行，版口自上而下依次为满文书名、汉文叶次。卷前雍正五年《御制孝经序》。

卷末有“慎斋主人”跋文以及两枚藏书章。跋文抄录如下：

书中蒙文，拟先君于嘉庆十七年（1812）在赛尔乌苏差次，令该处蒙古人联阿师手定之本抄录者。开卷前半页，尚拟先君手翰，罔宝藏之。咸丰三年（1853）二月，家被藉浸，此书沦落市井，余自成所归。于八年二月八日，在护国寺破书摊狼藉书堆中以千文票钞购之。先是五更自书店中购官本清宫小学，内缺《孝经》一本，套轂空旷，每以他书实之。至得此本，不惟故物复归为可喜，配之小学竟成全望，实快哉！

慎斋主人识

慎斋主人姓名籍贯有待考证。赛尔乌苏是清廷遣派理藩院司员管理蒙古地区台站的驻地之一，设置在他拉多兰台站，大概位于今蒙古国中戈壁省中部地区、省会曼德勒戈壁

(Mandalgobi) 东南方向^①。阿师, 旧指僧人。遂根据跋文可知, 此本《孝经》中的蒙古文为慎斋主人先祖于嘉庆十七年在赛尔乌苏驻地当差时, 着令该处的蒙古人结合僧人的手定本编定, 后几经辗转由慎斋主人购回, 恰好补充了当时清朝小学官方通行本中《孝经》的空缺。

4.hiyooging be acabufi suhe bithe 《孝经集注》, 清世宗厘定, 据雍正五年刻本晒印, 一册, 满文。线装, 白口, 开本 30.5×19cm, 版框 21.5×16.5cm, 四周双边, 单鱼尾, 每半叶七行, 小字双行, 版口自上而下依次为满文书名、汉文叶次。卷前雍正五年《御制孝经序》。

5.hiyoošungga nomun 《孝经》(图 1), 雍正五年译, 清文宗厘定, 咸丰六年武英殿刻本, 一册, 满汉合璧。线装, 白口, 开本 32.5×21.5cm, 版框 20.9×18cm, 四周双边, 每半叶五行, 版口自上而下依次为汉文书名, 汉文叶次。是书卷前有雍正五年《御制孝经序》、咸丰六年《上谕》。卷前钤有“国子监印”“民国七年由清监移藏图书馆”“京师图书馆藏书记”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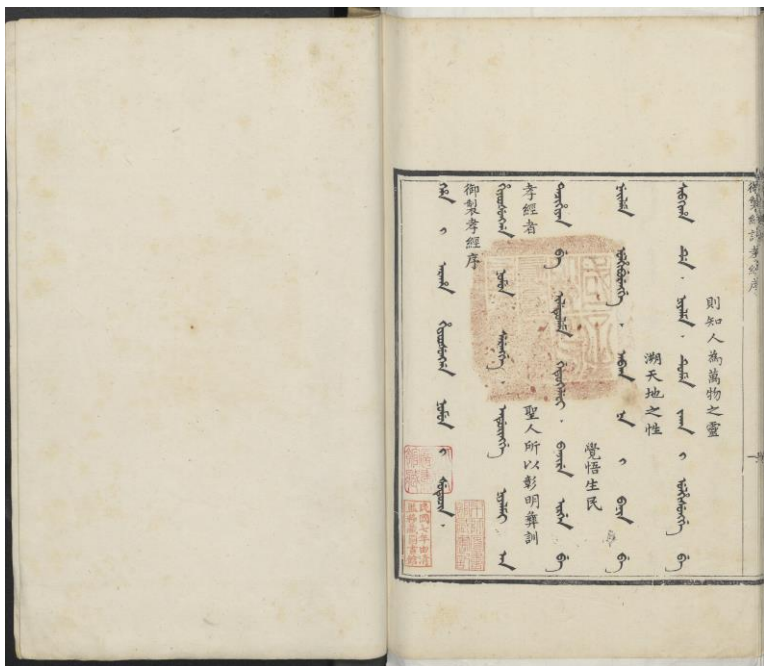


图 1 《孝经》咸丰六年武英殿刻本

6.hiyoošungga nomun 《孝经》(图 1), 清刻本, 不分卷, 一册, 满汉合璧。线装, 白口, 单鱼尾, 开本 24.3×15.5cm, 版框 19×14.2cm, 四周双边, 每半叶五行, 版口自上而下依次为满文书名, 汉文叶次。满汉文行文有朱笔圈点。

从以上六种馆藏文献可以看出, 国图藏清代满文《孝经》有如下特点:

首先, 国图藏清代满文《孝经》数量多, 便于集中研究。满文《孝经》主要收藏于国内外各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 以北京地区最为集中。《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共著录十二种满文《孝经》收藏情况^②, 其中一半的文献均集中藏于国图, 其他几种满文《孝经》分散在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大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处。从收藏数量角度来讲, 国图满文《孝经》馆藏量优势十分明显, 更利于研究人员前来集中研习。

^① 刘文鹏:《赛尔乌苏地理位置考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61—167页。

^②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0—13页。

其次,国图藏清代满文《孝经》版本全,便于比对研究。清代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分别作有翻译《孝经》,后世均在此基础上进行厘定重刊。这些早期版本中,仅有顺治十三年(1656)刻本藏于中国民族图书馆,其他如康熙朝和素校译本、雍正敕译本以及清后期咸丰厘定本均藏于国图,文献出版年代跨度很大。国图收藏的版本中包含刻本、抄本以及晒印本,种类很是丰富。而且这些藏品中有满文本、满汉合璧本以及满蒙合璧本,语言类型很多元。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出,国图藏满文《孝经》版本十分全面,便于从多角度进行比对研究。

二、清代不同时期满文《孝经》翻译特征

随着努尔哈齐对女真各部的统一,急需一种统一的文字来推动政令的下达实施,提升行政效率,并且统一的文字也有助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提升。努尔哈齐遂命臣下参照蒙古文创制出无圈点的“老满文”,并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正式推行^①。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皇太极又命达海在老满文的基础上“酌加圈点”^②,创制出了“新满文”。

自满文创制初始,便开始了满译汉文典籍的工作,如翻译《素书》《三略》《武经》等,多属用兵谋略之书,这与早期作战征讨有关。入关后,随着政局的稳定以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清朝皇帝更侧重于治世之道的学习,在翻译汉文典籍时的关注点也逐渐从军事转向文化,重视教化的作用。顺治十年制定“崇儒重道”的政策^③,表明在面对如何管理多民族统一国家等诸多现实政治问题时,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的选择,清廷将儒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儒家经典自然成为翻译的主要对象。

《孝经》分别于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被翻译三次,之后的《孝经》满译版本均以这三种作为参考,行文方式、翻译内容基本未出此范畴。后期满译内容变化最大的出现在乾隆朝“钦定新清语”之后,翻译时对《孝经》中的专有名词进行了“满化”。下面将对清代不同时期满文《孝经》翻译的特征进行列举说明,使用的版本分别为中国民族图书馆藏顺治十三年刻本《御制孝经》、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七年刻本《孝经》、雍正五年刻本《孝经集注》和咸丰六年武英殿刻本《孝经》。

(一) 顺治朝

顺治十三年曾颁行《御定孝经注》,书中内容以明代吕维祺《孝经大全》为主要参考来源,对《孝经》经文进行注解,其文字平实简洁,无深隐晦涩之语,意在“以布帛菽粟之言,昭广大中正之理”,最终使得“公卿士庶皆得循分以承欢”“东西南北罔不渐被而思服”^④。同时,这本《御定孝经注》又被翻译为满文,以供满人学习,此满文本现藏于中国民族图书馆。此时距离满文创制不过数十年,满文自身语法系统不够成熟,满文词汇量相对较少,而且满洲人对汉文文法和汉文化的理解尚未十分深入,所以在顺治朝满译的《御定孝经注》中存在明显的词义、语法翻译晦涩的情况。据《四库提要》言,《御定孝经注》“用石台本”

^①〔清〕鄂尔泰纂:《八旗通志初集》卷236《额尔德尼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327页。

^②《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1,天聪六年三月戊戌,中华书局,1985年,第156页。

^③《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4,顺治十年四月甲寅,第585页。

^④《御定孝经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5—268页。

作为参考，即唐玄宗所注《孝经》^①，下面将列表对比《御定孝经注》中的满文翻译及《孝经正义》对《孝经》原文的相关注释，以例证说明顺治朝满文《孝经》的翻译特征。

注：第二列中的《御定孝经注》满文翻译是对第一列中加点字的对应翻译，第三列中的《孝经正义》注释是对第一列中的加点字或相关语句的解释。

表 1

《孝经》原文	《御定孝经注》满文翻译及满文词义	《孝经正义》相关语句注释
曾子避席曰（《开宗明义章第一》）	jailafi 躲避，回避，规避	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对曰。
复坐（《开宗明义章第一》）	dahūme 重复	曾参起对，故使复坐。
身体发肤（《开宗明义章第一》）	yali 肉	肤，谓皮肤。
和其民人（《诸侯章第三》）	irgen（人民） i（的） niyalma（人）	协和所统之臣人。
言满天下（《卿大夫章第四》）	jaluka 充满	言行布满天下。
保其禄位（《士章第五》）	funglu（俸禄） soorin（王位）	保其禄秩官位。
夙兴夜寐（《士章第五》）	erde 清晨 dobori 夜晚	当早起夜寐，无辱其父母也。
以养父母日严（《圣治章第九》）	inenggi dari 每日	日加尊严。
德义可尊（《圣治章第九》）	dahaci 归服，跟随，听从	德义可以尊崇。
居上不骄，为下不乱（《纪孝行章第十》）	dele 上面；fejile 下面	此言居上位者不可为骄溢之事，为臣下者不可为挠乱之事。
三牲之养（《纪孝行章第十》）	ilan ulga be ulebume ujihe 把三牲饲养	虽复日日能用三牲之养，终贻父母之忧，犹为不孝之子也。
立于后世（《广扬名章第十四》）	ilinambi 起立，站立	则其令名常自传于后世。
无思不服（《感应章第十六》）	gūnin（想法） dahahakūngge（不归服） akū（没有）	无有思而不服者。

^① 《御定孝经注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82 册，第 257 页。

首先，顺治朝满译最明显的特征是其音译汉文专有名词很多。如表格中“禄”的翻译，即是汉文“俸禄”的音译。这种音译的现象多体现在如“诗经”“社稷”“庙”“簠簋”等专有名词上，这与满文创制初期词汇量相对较少以及对汉文化了解较少有关。当然，这种现象随着满汉交流的深入逐渐改变。

其次，顺治朝满译存在一些根据汉文字面意思进行翻译，从而导致误解的现象。如表格中“曾子避席”的“避”指“离开”，而非“躲避”之意；“复坐”指“坐回去”，而非“重复坐”；“立于后世”的“立”指“传名”，而非“站立”。以上三例是对汉字理解有误，有时也会出现与汉文相差甚远的翻译，如《御定孝经注》的序言中有“譬诸沙砾”一句，满文却将“诸”字译为 *šurha*，意为“野猪”，这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满洲人的翻译汉文经典事业尚处于萌芽期。

最后，顺治朝满译多据汉字直译，从而失去满文文法。如“民人”指“臣民”，满译按汉字逐一翻译为“人民的人”，不合语法；“三牲之养”指用牛、羊、猪三种牲畜奉养双亲，满译在 *ilan ulga*（三牲）与 *ulebume ujihe*（养）之间使用 *be*，表示使动，译为“把三牲饲养”，曲解了文意；“无思不服”的满译中，*gūnin* 对应“思”，*dahahakūnge* 对应“不服”，*akū* 对应“不”，虽对应汉文行文，但不符合满语行文逻辑，结构有些混乱。

（二）康熙朝

康熙帝自幼在关内生活和学习，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对儒家经典极为重视，敕译了大量的儒家典籍，康熙帝本人亦对翻译方法进行指导：

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通用者甚多。今之翻译者尚知辞意，酌而用之。后生子弟未必知此，不特差失大意，抑且言语欠当，关系不小……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①

这些被翻译的典籍不仅是皇帝用来同大臣探讨修齐治平之术，还被用来教导皇子皇孙及满洲子弟。所以康熙帝认为，在汉文典籍的满译过程中，需按照汉字字意翻译，以免言语失当，导致后世不知其意。这一翻译思路也体现在康熙四十七年刻本《孝经》（图1）中，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首先，康熙本中的音译现象明显。

表 2

《孝经》原文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大雅》	da ya
社稷	še ji
《诗》	ši ging
卿大夫	king daifu hafan
庙	miyoo
士	ši

按照康熙帝的翻译思路，表格中的汉文化专有名词，彼时并没有对应的满文词汇，所以对这些词进行音译，以防翻译不当。值得注意的是，顺治朝和康熙朝均有音译，区别在于，前者是因为满文初创不久，且接触汉文化时间较短，一些专有名词很难找到对应翻译，而后

^① 《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2册，中华书局，2009年，第658—659页。

者是为避免后人理解失当而进行的保守翻译,对于可以理解的专有名词,康熙本是选择意译的,如“簠簋”一词,顺治本音译为“fu gui”,而康熙本则意译为“wecere jaka”,意为“祭神的物品”,可见康熙本的进步。

其次,康熙本整体按照汉字字意和结构翻译。

表3

《孝经》原文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无念尔祖（《开宗明义章第一》）	sini mafari be gūnirakūn
法服（《卿大夫章第四》）	koolingga etuku
以敬事长则顺（《士章第五》）	ginggun i unggga be weileci uthai ijishūn

按汉字字意和结构翻译的优点是,便于将汉字和满文一一对应,翻译内容不至于天马行空。但是这种逐字翻译的方式也很容易导致忽略满汉文中的语法使用,从而造成文意逻辑失当甚至是理解错误。如表格中“无念尔祖”译为“常思念你的祖先”,“无”字为语助词,没有实际意义,而康熙本中的“sini”对应“尔”,“mafari”对应“祖”,“be”表使动,“gūnirakūn”译为“不思念”,将原文“无”字理解为否定词,显然不正确。如“以敬事长则顺”一句,满文是对汉文的逐字翻译,“ungga”译为“长辈”,意在对应汉文原文“长”,《孝经正义》言“长,谓公卿大夫,言其位长於士也”,此篇讲述士之孝,所以这里的“长”应为级别高于士的人,而非字面意思的“长辈”。康熙本虽在汉文直译的时候出现一些瑕疵,但相较于顺治本还是有一些进步,如顺治本将“法服”译为“fafun i etuku”,康熙本译为“koolingga etuku”,两种满译均对应汉文,但fafun侧重“法律”,koolingga侧重“礼法”,很明显这里指先王的礼法,所以康熙本更侧重对原文的理解。

最后,康熙本翻译内容借鉴顺治本的同时,又在其基础上完善。

表4

《孝经》原文	顺治十三年刻本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身体发肤（《开宗明义章第一》）	beye gubci funiyehe yali	beye gubci funiyehe yali
中于事君（《开宗明义章第一》）	dulimbade han be weilembi	ejen be weilerengge dulimba
不在于善（《圣治章第九》）	sain de akū	sain be kicerakū

比较康熙本和顺治本的满译全文可以看出,康熙本在涉及句意主干的动词词根或名词使用上基本沿袭了顺治本,存在一些语法、助词的变动。如表中“中于事君”一句,两者都使用词根“dulimba-”对应“中”,词根“weile-”对应“事”,两者翻译只是行文结构的变化,并未影响句意,最大的区别是顺治本将《孝经》中的“君”译为“han”,即满族文化中的“汗”,康熙本则改为“ejen”,即“君主”,后者翻译更贴近汉文化。再如“不在于善”的“不”字,顺治本仅用“akū”一词表否定,康熙本则细化为“kicerakū”,译为“不谋求”。当然,康熙本也顺延了顺治本的讹误,如“身体发肤”的“肤”依旧被译为“yali”,即肉。

（三）雍正朝

有清一代，共有两次御注《孝经》的行为，一次为顺治十三年颁行的《御定孝经注》，另一次即雍正五年的《御纂孝经集注》。《御纂孝经集注》基本取材于明代陈选的《孝经集注》，注文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御纂孝经集注》的序言以及《四库提要》均未明确指出书中注文的援引所在。雍正帝虽在位时期较短，却敕谕纂修并翻译了《孝经集注》，可见其对《孝经》的重视程度，其目的意在培养臣民“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①，教导臣民移孝作忠，这或许与雍正登基后复杂的政治局面有关。

雍正承继父祖遗绪，在前朝满译《孝经》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虽然延续了一贯的音译方式，却在继承的同时，在意译方面有所创新，对汉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深入。

首先，雍正朝延续前朝的音译方式。

如表 5 中所示，在涉及汉文化中的专有名词，雍正朝依旧延续顺治、康熙两朝的音译方式，并未做出改变。

表 5

《孝经》原文	雍正五年刻本
《大雅》	da ya
社稷	še ji
《诗》	ši ging
卿大夫	king daifu hafasa
庙	miyoo
士	ši
师尹	ši yen

其次，相较于顺治朝，雍正朝更多借鉴参考康熙朝的翻译内容。

表 6

《孝经》原文	顺治十三年刻本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雍正五年刻本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卿大夫章第四》）	nenehe wang ni fafun i etuku waka oci, olhome eturakū.	nenehe wang ni koolingga etuku waka oci, gelhun akū eturakū.	nenehe wang ni koolingga etuku waka oci, gelhun akū eturakū.
孝无终始（《庶人章 第六》）	hiyoošun de da dube akū	hiyoošun de duben deribun akū bime	hiyoošun de duben deribun akū bime
德义可尊（《圣治章 第九》）	erdemu jurgan be dahaci ombi	erdemu jurgan be wesihuleci ombi	erdemu jurgan be wesihuleci ombi

从以上所举三例可以看出，雍正本与康熙本的内容完全一致，而与顺治本差别较大。如对于名词“法服”的翻译，雍正本译为了康熙本的“koolingga etuku”，而没有译为顺治本的“fafun i etuku”。如对于动词“尊”的翻译，雍正本译为了康熙本的“wesihuleci”，而没有译为顺治本的“dahaci”。这两处的翻译情况比对前文已提过，明显康熙本的翻译更佳。对于句子的翻译，如“孝无终始”一句，在词语使用和行文方式上，雍正本和康熙本一模一

^① 《御纂孝经集注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82 册，第 269 页。

样，而与顺治本不同。顺治本和康熙本均符合汉意，但后者对汉文的理解更深入，译文也更符合满文文法。经笔者比对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全部满译内容发现，雍正本的译文更多受康熙本的影响。

最后，雍正朝在前两朝满译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表 7

《孝经》原文	顺治十三年刻本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雍正五年刻本
身体发肤（《开宗明义章第一》）	beye gubci funiyehe yali	beye gubci funiyehe yali	beye gubci funiyehe sukū
谨身节用（《庶人章第六》）	beye be gingguleme, malhūšame baitalame	beyebe gingguleme, baitalan be kemneme	beyebe olhošome, baitalan be kemneme
不在于善（《圣治章第九》）	sain de akū	sain be kicerakū	sain be girkūrakū

雍正本的行文方式、词汇使用整体受康熙朝的影响，但并不是全面的照搬照抄，而是在前两朝翻译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词语的使用上。上面表格中，顺治朝和康熙朝均将“身体发肤”的“肤”字翻译为“yali”，即“肉”，《孝经正义》言“肤，谓皮肤”，雍正本将满译纠正为“sukū”，译为“皮肤”，符合汉意。“谨身节用”的翻译，雍正朝保留了康熙朝对“节用”的翻译，即“baitalan be kemneme”，而“谨身”的翻译，雍正朝改动了前两朝对“谨”的翻译，“gingguleme”侧重“敬重”，雍正本改为“olhošome”，强调“谨慎”，《孝经正义》注释：“谨慎其身，节省其用，以供养父母”，可见雍正本领会其意。“不在于善”的“不”字，顺治本的“akū”单纯表示否定，康熙本的“kicerakū”译为“不谋求”，雍正本的“girkūrakū”译为“不专心”，《孝经正义》言：“在，谓心之所在也。”这种向善之意更多是一种是内心的向往，所以比较而言，雍正本的翻译更能传达出汉文的意境。

（四）咸丰朝

咸丰六年武英殿刻本《孝经》前有上谕如下：

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奉上谕，《翻译孝经》系雍正年间编辑，为八旗各项考试命题之本，向无清文汉字合写成书。且其时满洲新语未备，书中音义，皆系旧语。现在各省驻防乡试、童试，举行翻译，已历有年。在京各项考试，尤为八旗士子进身之阶。诚恐其循诵传习，不免参差简略。朕因详加校阅，遵照乾隆年间《钦定翻译五经新语》，悉加厘定，着武英殿刊刻，清文汉字合璧成书，颁行中外。俾各士子讲习有资，用昭法守，钦此。

由上谕可知，此咸丰武英殿刻本以雍正五年刻本《翻译孝经》为底本，据乾隆年间钦定的“新清语”进行改动厘定，且首次以满汉合璧的方式刊行《孝经》。这里的《翻译孝经》即雍正五年刊刻的《孝经集注》。乾隆时期，满人汉化现象十分明显，许多满人讲满语时夹带大量汉语音译词汇，满文书写错字连篇，甚至不会骑马射箭，“国语骑射”国策受到严重挑战。乾隆皇帝有感于此，对满文进行了全面的规范与创新，内容包括创制新词术语、意译汉文专有名词、规范满文语法、符合满文语气等，此次钦定后的满语称为“新清语”，此前则称“旧语”。乾隆年间御制翻译的四书五经是新清语实际应用于满译文本中的突出代表，

咸丰武英殿即以《钦定翻译五经新语》为参考，对雍正五年刻本重加厘定，并刊刻出版。所以通过比对雍正五年刻本和咸丰武英殿刻本的内容，可以了解“钦定新清语”前后《孝经》翻译内容的变化。

表 8

《孝经》原文	雍正五年刻本	咸丰六年武英殿刻本
《孝经》	hiyoo ging	hiyooš unggga nomun
万物之灵（雍正五年序）	tumen jaka ci sure	tumen jaka i ulhisungge
士大夫（雍正五年序）	ši daifu hafan	hafasi daifan
子（《开宗明义章第一》）	kungdzi	fudzi
先王（《开宗明义章第一》）	nenehe wang	nenehe han
事（亲）（《开宗明义章第一》）	weilembi	uilembi
《大雅》（《开宗明义章第一》）	da ya	amba šunggiya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开宗明义章第一》）	sini mafari be gūnirakūn, erdemu be fisembume dasa.	suweni mafa be gūnici, erdemu be dasakini.
《甫刑》（《天子章第二》）	fu hingfiyelen	fu gurun i lioi heo i erun i fiyelen
一人有庆（《天子章第二》）	emu niyalma sain oci	emu niyalma de urgun bici
社稷（《诸侯章第三》）	še ji	boihoju jekuju
《诗》（《诸侯章第三》）	ši ging	irgebun i nomun
卿大夫（《卿大夫章第四》）	king daifu hafasa	saitu daifan
先王之法服（《卿大夫章第四》）	nenehe wang ni koolingga gisun	nenehe han i koolingga etuku
庙（《卿大夫章第四》）	miyoo	muktehen
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士章第五》）	erde ili goidafi dedu, simbe ujihangge be ume gūtubure.	erde ilire dobori dedure de, simbe ujihengge be gūtuburakū oci ombi.
赫赫师尹（《三才章第七》）	horonggo eldengge ši yen	horonggo horonggo yen halangga taiši
郊祀（《圣治章第九》）	hiyoo i wecen	ten i wecen
明堂（《圣治章第九》）	ming tang	eldengge tanggin
上帝（《圣治章第九》）	dergi di	dergi abkai han
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圣治章第九》）	sain niyalma ambasa saisa, terei durun jurcerakū.	mergen niyalma ambasa saisa, terei yongsu jurcerakū.
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	wargi dergi julergi amargi,	wargici dergici julergici

不服（《感应章第十六》）	dahara be gūnirakūngge akū.	amargici, dahajire be gūnirakūngge akū.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事君章第十七》）	mujilen i hairambi, ainu tuciburakū.mujilen dolo tebumbi, ya inenggi onggombi.	mujilen i buyere be, ainu tucibume alarakū ni. gūnin de tebuhei bikai, atanggi teni onggombi.
棺槨（《丧亲章第十八》）	hobo horho	hobo hoborho
簠簠（《丧亲章第十八》）	fu guitetun	fisitun handutun

首先，咸丰本存在大量意译汉文专有名词的现象。对于以往大量音译的汉文专有名词，咸丰本中的意译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创制新的满文词汇对应汉文，另一种是在理解词义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如“士”在雍正本中为音译“ši”，咸丰本中则是创制的对应词汇“hafasi”；如“簠簠”在雍正本中音译为“fu gui”，咸丰本中“簠”和“簠”分别对应创制的新词“fisitun”和“handutun”。再如“卿大夫”“社稷”“庙”等词的满译均是创制的新词，这些新词极大地丰富了满语词汇。咸丰本中“师尹”被翻译为“yen halangga taiši”，即“尹氏太师”；“郊祀”是一种祭祀天的行为，咸丰本中译为“ten i wecen”，表示“极致的祭祀”，显然这是对汉文化有所了解后的翻译。

其次，咸丰本中的译文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完善改进。雍正本的译文已经是几代人打磨后的成果，但仍不免有些许不妥甚至错误，咸丰本的内容相较于雍正本有明显的进步。如“一人有庆”中的“庆”字，雍正本翻译为“sain”，“淑人君子”中的“淑”字，雍正本亦翻译为“sain”，“sain”有“好，吉，贤，巧”等诸意，雍正本用“sain”来对应多个有此等意思的汉字，咸丰本中的内容则将满译细化，以“urgun”译“庆”，指“喜，吉”，以“mergen”译“淑”，指“贤，智慧”。除了完善雍正本的译文以外，咸丰本的内容还修改了雍正本的错误，如“无念尔祖”的“无念”，一种解释是“无”为语词，“无念”即“念”，另一种解释是“无念”即“无忘”，无论那种，这里的意思都指“思念祖先”的肯定意思，但雍正本将“无念”翻译为“gūnirakūn”，表示出“不思念”祖先的意思，这是不正确的。咸丰本的内容则正确理解了汉文文意，用“gūnici”对应“无念”，表示“思念”祖先。

最后，咸丰本的内容更符合满文行文方式。前代的满译更注重与汉文的一一对应，强调“照字翻译”，虽避免了“差失大意”“言语欠当”等弊端，但也容易墨守成规，导致翻译晦涩，缺少满文语气。表格中“先王”的“王”，雍正本音译为“wang”，“上帝”的“帝”，雍正本音译为“di”，这两处咸丰本均译为“han”，满洲人将君主或首领称为“汗”，咸丰本的翻译更体现满人特色。“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一句，雍正本满译的汉文意思是“心中所爱，因何不出。心内怀有，何日忘记”，接近于汉文直译，言语较为晦涩。咸丰本的翻译为“心中所爱，为何不说出呢？怀于心中，何时才忘记呢”，满译使用了介词“be（把）”“de（在）”、副词“teni（才）”以及语气词“ni（呢）”等，使文意更加完整、语气更加生动，行文也更符合满文文法。另外，雍正本中存在语法错误，如“mujilen i hairambi”，“mujilen”为名词“心”，“hairambi”为动词“爱”，“i”为助词“的”，这种“名词+的+动词”的行文是不符合语法的，咸丰本则将动词词性的“hairambi”换为了具有名词属性的“buyere”，这两个词词义相近，后者更符合满文语法。

三、结语

提及满文文献，学界关注点往往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实际上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典籍同样值得挖掘。本文仅以满文《孝经》为例，证明国图馆藏满文文献在数量、内容的优势，并主要依托国图所藏满文《孝经》对清代不同时期的满译特征进行举证探究。

通过对比分析顺治、康熙、雍正、咸丰四朝的满文《孝经》版本可以看出，清早期满文初创，且对汉文化了解较浅，在翻译汉文典籍时多采取汉文直译的方式，强调与汉字的一一对应，对于汉文化专有名词均采用音译，存在一些语意晦涩、句意不完整、文意逻辑失当、语法错误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康熙、顺治两朝有所改善，但音译现象仍未改变。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满译虽然存在一些瑕疵，却为后世的厘定重刊提供了模板。乾隆朝推行“钦定新清语”，对满文语法进行规范，使翻译文句更符合满文风格，且创制新词对应汉文专有名词，改变了以往大量的音译现象。咸丰朝继承“新清语”词汇，并以此厘定前期满译文献。

从清代满文《孝经》的翻译史可以看出，清朝确在着力传承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文化，大量翻译儒家经典《十三经》，使得儒家经典有了新的传播载体，在满族社会中得到广泛流传。近年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特别指出：“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整理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毫无疑问，满文《孝经》正是能够反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古籍文献，包括《孝经》在内的满文古籍文献是清代各民族特别是满汉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丰富内涵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